

木陳道忞別集的流傳、刊刻 與相關問題

陳曉丹*

摘要

現存木陳道忞別集《北遊集》六卷，《西巖隱集》，《布水臺集》二十卷、三十二卷，《百城集》三十卷，分藏於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清初《布水臺集》流傳較廣，錢謙益曾為作序，順治帝、黃宗羲曾經翻閱。現存別集的版本文獻價值較高：各集皆有不見於他載的篇目，其中個別十分罕見；《布水臺集》二十卷、三十二卷屬《徑山藏》之《又續藏》版本，且三十二卷本中科本與臺北本版刻不一，從中可窺《又續藏》較為複雜的版本情況；《百城集》作品的編年繫地為道忞行跡遊蹤的考訂提供了可靠的時間坐標，且是有關道忞康熙七年至十三年活動的唯一資料。流傳、現存道忞別集間的主要關係：康熙六年或稍後《禪餘集》《布水臺集》《雲僑集》《西巖隱集》《北遊集》《停梅集》等六集合編增刪成《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此本經篇目增刪、文字修訂後於康熙十三年形成《百城集》。此一文本的增刪修訂，與道忞政治立場的轉變關係不大，一定程度上是道忞失去愛新覺羅·高塞的政治庇護、康熙初期「汰僧」不息的政治氛圍、「黃培詩案」的發生等因素綜合影響下的結果。綜合來看，木陳道忞別集對於明末清初佛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清初、木陳道忞、別集、文本問題、文獻價值

2021年11月22日收稿，2022年8月9日修訂完成，2022年10月27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前言

木陳道忞（1596-1674），俗姓林，名蒞；字木陳，號山翁，晚號夢隱道人。臨濟宗三十一世，密雲圓悟（1567-1642）法嗣。弱冠補弟子員，明天啟二年（1622）從若昧智明（1569-1631）鬚落，後由憨山德清（1546-1623）授具足戒，又親炙無念深有（1544-1627）。崇禎元年（1628）參密雲圓悟，七年後獲記莛。崇禎十六年（1643）入主浙江寧波天童寺。清順治二年（1645），他同弘光行軍兵備職方司郎中黃日芳（1606-?）謀劃安頓明臣後代梅之煩。後主持慈溪五磊、台州廣潤、紹興大能仁、湖州道場山、青州大覺寺，再主天童，晚年開紹興平陽大利。順治八年（1651），紹台兵備道耿應衡被控奉道忞、繼起弘儲（1605-1672）為彌勒下生，次年道忞、弘儲被監禁在永嘉獄中。順治十六年（1659）九月至十七年（1660）五月，道忞在清宮弘法，順治帝（1644-1661 在位）令以門弟子視之，賜號弘覺禪師。當時，道忞還與順治帝庶兄高塞（1637-1670）、納喇明珠（1653-1708）等相識結緣。康熙元年（1662），道忞懇求高塞行職權之便，讓受「通海案」牽連的錢價人（?-1662）之弟錢志熙、錢志焯、錢志燾等聽贖還鄉。康熙四年（1665），兩廣總督盧興祖（?-1667）上沙汰僧人之章，道忞特陳汰僧利弊，進呈杭州督台，得到明珠曲垂弘護、有所諫言之助。康熙十三年（1674），道忞示寂，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道忞親歷明末清初多場佛門諍論，包括天童塔銘諍、密雲彌布扁諍、靈巖樹泉集諍、牧雲五論諍、雲門雪嶠塔諍、平陽御書樓諍、天童寺住持諍、萬如通微示寂後的龍池之諍等。¹ 據不完全統計，道忞一生交遊的對象高達三百以上，包括法兄弟侄費隱通容（1593-1661）、牧雲通門（1599-1671）、繼起弘儲等，法嗣山曉本哲（1620-1686）、旅庵本月（?-1676）等，曹洞宗覺浪道盛（1593-1659）、三宜明孟（1599-1665）、百愚淨斯（1610-1665）等眾多佛門人

1 陳垣《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詳細論述了道忞在天童塔銘諍、密雲彌布扁諍、靈巖樹泉集諍、牧雲五論諍、雲門雪嶠塔諍、平陽御書樓諍等六諍中的情況，至於天童寺住持諍、萬如通微示寂後的龍池之諍則未論及。有關天童寺住持諍的討論，詳見：（日）野口善敬，〈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天童寺の住持について：密雲圓悟の後継をめぐる〉，《禅学研究》89（2011. 2）：17-45。

士。除了佛門人士外，有明遺民黃毓祺（1589-1649）、吳甡（1589-1670）、徐之垣（1595-1655）、錢光繡（1614-1678）、祁駿佳、李鄴嗣（1622-1680）、王時敏（1592-1680）、錢纘曾（?-1662）、王譽（1589-1662）、胡介（1616-1664）、范驤（1608-1675）等，又有仕清者龔鼎孳（1615-1673）、紀騰蛟、韋克振、耿應衡、周荃（1605-?）、費景煊、金之俊（1593-1670）、楊雍建（1627-1704）等。學界認為，道忞原是深具遺民姿態的叢林領袖，²後成為順治帝之師，對清初政治、禪宗產生重要影響。³他繼承密雲圓悟的衣鉢，將「臨濟宗風」「天童家風」在清初發揚光大。此外，現存道忞詩文約 914 題 1550 篇，反映了他在明末清初豐富複雜的活動。清初大家錢謙益（1582-1664）、黃宗羲（1610-1695）均為道忞的詩文集作序。錢謙益「讀其全集，為之心開意解，久之，沉吟低回，歎歎煩醒，而不能舍然也」，黃宗羲稱其詩文「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並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汜濫」。值得注意的是，道忞帶動起本支脈僧人興盛的詩文活動，其法嗣及法孫——山曉本哲、天岸本昇（1620-1673）、遠庵本體（1622-1682）、鐵夫元立、心壁超淵、慰弘元盛等人，或問詩於文士，或與文人共編詩文集、相互酬唱。由此可見，道忞一生交遊甚廣，經歷豐富，在明末清初的政治、佛門、文學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

道忞的傳世作品，有《北遊集》六卷，⁴《布水臺集》二十卷、⁵三十二卷，⁶《西巖隱集》，⁷《百城集》三十卷，⁸《山翁忞禪師語錄》二十二

2 廖肇亨，〈淫辭豔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清初戲曲美學的佛教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6(2005.3): 127。

3 姜伯勤指出，道忞是一位對清初禪宗史產生過全域性影響的人物。姜伯勤，〈論木陳道忞〉，收入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編，《潮學研究》第1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頁16。

4 清·木陳道忞說，雪樵真樸編次，《弘覺忞禪師北遊集》6卷（《明版嘉興大藏經》第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頁287-307。

5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卷（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6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第26冊），頁309-437。

7 清·木陳道忞，《西巖隱集》（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藏鈔本）。

8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30卷（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卷，⁹《天童弘覺忞禪師語錄》二十卷，¹⁰《禪燈世譜》九卷，¹¹《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¹² 它們是研究明末清初佛門與政治、文學關係的珍貴材料。但由於個別作品的文本情況不明，學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北遊集》和《布水臺集》三十二卷。¹³ 有關別集的文本研究，上世紀六十年代，饒宗頤首先提出錢謙益所讀全集本是否黃宗羲所見《百城集》的疑問，¹⁴ 冼玉清繼而推測《布水臺集》二十卷本刻於順治十六年前。¹⁵ 二十年後，饒宗頤認為《百城集》可能已併入《布水臺集》中，¹⁶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日本學者野口善敬通過文本比對，得出三十二卷本《布水臺集》是二十卷本《布水臺集》和《西巖隱集》的合編。¹⁷ 此後，對道忞的別集版本及關係的討論陷於停滯。當前學界對道忞別集的流傳、現存版本的內容性質及諸

9 清·木陳道忞，《山翁忞禪師語錄》22 卷（《徑山藏》第 207-208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10 清·木陳道忞，《天童弘覺忞禪師語錄》20 卷（《徑山藏》第 164 冊），頁 420-619。

11 清·木陳道忞，《禪燈世譜》9 卷（《禪宗全書》第 1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1117-1272。

12 清·木陳道忞，《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道忞和尚選集》，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17），頁 307-344。

13 陳垣利用《北遊集》等撰成〈湯若望與木陳忞〉、〈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等文（見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482、517、533。所撰《清初僧諍記》中天童派之諍、新舊勢力之諍的討論（見陳垣，《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34-79。）使用了《布水臺集》（32 卷本）和《百城集》的大量材料。藍建雄「道忞法師研究」（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75），深入討論了《北遊集》的禪學和外學等問題。謝正光，〈新君舊主與遺臣——讀木陳道忞《北遊集》〉，《中國社會科學》2009.3(2009.5): 186-203，該文重構《北遊集》的人物關係以見曹化淳在順治朝發揮的歷史作用。（日）荒木見悟〈禪と名教——木陳道忞の変節〉，《東洋古典學研究》1(1996.5): 11-23 一文利用《北遊集》、《布水臺集》（32 卷本）等討論明清之際佛教與名教間的困境。

14 饒宗頤，《潮州藝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540。

15 冼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130。

16 饒宗頤，〈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臺集》〉，《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頁 562。

17 （日）野口善敬，〈關於木陳道忞的著述〉，收入黃俊傑等編，《東亞文化的探索——傳統文化的發展》（臺北：正中書局，1996），頁 500。

本關係等問題仍未獲得清晰認識，這顯然不利於這批珍貴材料的研究和利用。因此，本文以道忞別集的文本問題為中心，對流傳、現存別集進行系統考述，以便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文獻基礎。同時在文本的具體考述中，將論述清初佛門與政治的相關問題，進而說明文本修訂背後的深層原因。

二、道忞《布水臺集》的流傳

康熙十三年，道忞在《百城集自序》中提及，所撰《禪餘集》、《布水臺集》、《雲僑集》、《西巖隱集》、《北遊集》、《停梅集》、《百城集》已形成並流傳。當時，流傳較廣的是《布水臺集》。順治、康熙年間，《布水臺集》曾反復編訂、增刪，在此過程中，曾有包爾庚（?-1663）、王挺（1619-1677）、錢謙益、黃宗羲、王仕雲等人寓目處在成書的不同階段從而具有不同樣貌的《布水臺集》。這六個不同樣貌的《布水臺集》應是在一個稿本上增刪而成，且並未刊印。但為方便區別和考述，本文暫以「序本」或「經眼本」分別稱之。

（一）順治年間包爾庚序本

包爾庚，字長明，號宜壑，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明遺民。崇禎十年（1637）登進士第，官廣東羅定知州。後擢兵科給事中，乞養歸里。順治二年寓居於鄞，不赴魯監國之召，後歸松江，康熙元年曾參修《松江府志》。¹⁸ 包爾庚〈布水臺集序〉見於《布水臺集》二十卷本。序末有「四明流寓」的自稱，可知他作序時仍在鄞縣。序中又言「禪者澹然無所系於世」，說明在他作序時道忞尚未應召入宮。則此序應作於順治二年至十六年（1645-1659）包爾庚寓鄞期間。¹⁹

〈布水臺集序〉中提及《布水臺集》收有〈義僕傳〉一文，但此文不

18 以上有關包爾庚的介紹，見於：（1）清·馮鼎高修、王顯曾等纂，《（乾隆）華亭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輯》第1編第3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卷14，頁532-533。（2）清·錢維喬修、錢大昕等纂，《（乾隆）鄞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輯》第1編第75冊），卷18，頁406。

19 順治二年至十六年，這一時間跨度稍長。但限於資料，筆者目前只能作此考述。

見於二十卷本第三卷傳記類，卻見於第十三卷見聞雜記，且沒有題名。而此文在三十二卷本及《百城集》中皆題為〈義僕傳〉，收在傳記類。從傳記一般依據傳主材料來撰寫的特點來看，應是道忞先在雜記中錄義僕事跡，後才在義僕事跡的基礎上單獨成傳。包爾庚見義僕一文列於見聞雜記，認為義僕「有類古之良大臣」、「忠孝節義」，故題「義僕」名，進而突出道忞詩文所飽含的「君臣之義」遺民精神。後出《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據此將義僕一文獨立成傳，《百城集》又襲之，反映了道忞對包爾庚解讀的認可。

（二）順治九年王挺序本

王挺，字周臣，號減庵，蘇州府太倉州人。崇禎十二年（1639）他因對策傷時被斥，以門蔭授中書舍人，不久即乞養。入清後不仕，因病廢目，以耳、口治文授書。²⁰ 道忞曾為王挺寫贊，有「天上石麒麟」、「抱揮戈復日之深衷」等語。²¹ 王挺〈布水臺集序〉見於《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次於包爾庚序。王序稱：「（道峰山翁和尚）近有慨於佛法之濫觴也，思韜晦而護持之，飛錫過婁，將度大江，走匡廬，與學徒依止于深山大谷之間，若將終身焉」，²² 據此可知，此序作於道忞退道峰後，寓居婁東、將往廬山時。道忞〈壽龍池萬和尚六句序〉載：「壬辰冬，余退道峰，寓婁」，²³ 〈再游梅溪小記〉載：「己卯去今壬辰十有四年。秋，適予退道峰，歸隱匡廬」。²⁴ 牧雲通門〈復道峰木陳和尚〉記：「（十月）初二到寺。……二上座至，知行錫在婁東，與吳太史、王奉常諸君子為法喜遊。」²⁵ 道忞覆

20 清·王時敏，附〈減庵公事略〉，《王煙客先生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648。

21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本），卷21〈周臣王內史〉，頁391。另見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卷本），卷15〈周臣王內史贊〉，葉7。

22 清·王挺，〈布水臺集序〉，《布水臺集》（20卷本）。

23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本），卷9〈壽龍池萬和尚六句序〉，頁342。另見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卷本），卷7，葉19-21。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15，葉1-2。

24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卷本），卷6〈再游梅溪小記〉，葉4。

25 清·牧雲通門，《懶齋別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冊，濟南：齊魯書社，

信通門，言將在太倉度歲。²⁶即順治九年（1652）九月道忞已在婁東，直至本年度歲，則王挺序當作於順治九年九月前後。

王序指出，道忞「別有撰著二十卷，為今《布水臺集》」。王挺所見與今存《布水臺集》二十卷本的卷數相同，但二者非同一版本。經與《百城集》的編年繫地對照，今存二十卷本所收〈見聞雜記〉其六、其十二作於順治十三年（1656），〈靈隱嵩居如公塔銘〉、〈辨訛說〉作於順治十四年（1657），順治九年王挺作序時並未見到這些作品。即今存二十卷本在王挺序本的基礎上有所擴充，不過卷數未變。

王挺、包爾庚皆明遺民，二人序言以「忠孝節義」為主題，顯示了這一時期道忞在遺民群體中的地位。王挺序特別說到了清初遺民推崇同時釋家文集的主要原因：由明入清的文人因凜凜於政治禍害而不敢放言高論，抒發易代之悲。釋家卻奉出世法，²⁷與世無涉，²⁸相較於文人未受到過多的政治制約，故而得以冷眼觀天下，聊舉忠孝之思，直抒悼明哀思。²⁹道忞在文集中無所顧忌地感懷故明、伸張節義，對此王挺十分敬佩。

（三）順治十六年錢謙益序本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探花，官至禮部尚書。弘光政權敗後降清，任清朝的禮部侍郎，五個月後告病歸鄉，暗自參加反清復明活動。虞山錢氏世代信佛，錢謙益

2001），卷5〈復道峰木陳和尚〉，頁175。

26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本），卷27〈復古南牧和尚（別兄溪上）〉，頁414。另見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卷本），卷20〈與天童牧和尚（別兄溪上）〉，葉17。

27 釋家，即王挺序中的「圓頂方袍之輩」。據序文所述，「圓頂方袍之輩」「以苦心冷眼觀天下之波靡」，可知此輩應不包括明清鼎革之際的明遺民逃禪者。

28 實際上，晚明江南叢林已出現山林佛教向經世佛教思潮轉變的傾向，見於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從現存道忞的詩文集來看，經歷晚明叢林經世思潮的道忞，秉持濟世悲懷、力勸弘法的經世思想。但是，清初王挺仍基於傳統觀念，以為叢林屬山林佛教，與世無涉。

29 清·王挺，〈布水臺集序〉，《布水臺集》（20卷本），卷首。舉忠孝，悼故明，此行正與山林佛教旨趣相悖，而顯示出強烈的入世思想。

亦是一名佛門居士。³⁰

錢謙益〈布水臺集序〉³¹見於《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又被題為〈百城集序〉收入《百城集》。作序時間，據中科院藏《布水臺集》、中國國圖藏《百城集》記載，為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順治十六年初，錢謙益為密雲圓悟撰寫塔銘期間，曾翻閱《布水臺集》並為其作序。他在寫給道忞的信中提到：「布水二集繙閱再三，偶一根觸，放筆作序，大率皆撐腸拄腹、薄喉衝口之談，譬如病人嚙語、酒人罵坐。李禿翁有言『奪他酒杯，澆我塊壘』。」³²信中所說即是該序。「布水二集」即《布水臺集》上、下二集。經與《百城集》的編年繫地對照，《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收錄了大量順治十六年後的作品，而錢謙益作序於順治十六年，故錢謙益所見非今存三十二卷本。今存《布水臺集》二十卷本結集、刊刻的時間約在順治十六年前，錢謙益序本應相當接近今存的二十卷本。錢序認為道忞「孤撐單出，流連涕泗于陸沈滄海之餘」、「現忠義士大夫身而為說法」，高度推崇道忞在明清鼎革之際所顯示的忠義精神。

道忞弘法宮廷期間，順治帝曾展閱《布水臺集》。「上復展閱，見其中有〈薦嚴毅宗烈皇帝疏〉。上曰：『毅宗莫不是崇禎帝麼？』師曰：『然。』上曰：『本朝諡思宗，非毅宗也。』師曰：『忞僻遠疏虞，聞江南諡如此，而不知本朝有別諡也。』上曰：『此亦何妨。』」³³此疏，《布水臺集》二十卷本作「薦嚴毅宗烈皇帝疏」，《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百城集》作「烈皇帝薦嚴疏」。可知，順治帝所見《布水臺集》應與錢謙益序本大體一致。

（四）康熙八年黃宗羲經眼本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明末三大思想家」

30 （日）吉川幸次郎，〈居士としての錢謙益〉，收入氏著，《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6 卷（東京：築摩書房，1970），頁 36-54。

31 《有學集》收錄此序。見於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 21〈山翁禪師文集序〉，頁 876。

32 清·錢謙益，《錢牧齋先生尺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 4〈與木陳和尚·其一〉，頁 294。

33 清·木陳道忞，《弘覺忞禪師北游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0 冊），卷 3，頁 488。

之一。清軍南下時，他組織義兵隨魯監國抗清，江上兵潰後退守四明山，後隱居黃竹浦。他與道忞弟子及其再傳弟子詩文往來頻繁，經常相互酬唱、評點詩文。³⁴

康熙八年（1669）己酉春，黃宗羲游雲門。³⁵其〈山翁禪師文集序〉載：「歲乙酉，余游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³⁶乙酉，是順治二年，時道忞尚未歸平陽。「乙酉」當是「己酉」之誤。據此序，康熙八年黃宗羲訪平陽，道忞出文集六冊請刪為四冊，但黃宗羲並未完成其所託。

此文集為何種？時道忞七十四高齡，所出六冊有很大可能是全集性的文本，因此才有刪定之說。〈百城集自序〉所列《禪餘集》等六集皆非全集，唯《百城集》具有全集性質，但《百城集》結集於康熙十三年。實際上，此六冊很接近於、很有可能就是今存的《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是由《禪餘集》等六集合編增刪後形成的全集本，這將在下文「《布水臺集》與諸集的關係」一節論證。經與《百城集》的編年繫地對照，《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所收最晚作品是康熙六年（1667）的〈臨海新興法輪寺募緣疏〉、〈聖月錢居士贊〉，這與康熙八年道忞請黃宗羲刪定文集在時間上正可銜接。

（五）康熙十年王仕雲序本

王仕雲，字望如，號過客，徽州府歙縣人。順治二年任鎮江府訓導，順治九年進士，授泉州府推官。康熙五年（1666）任衡州府推官，又調廣東梅州知縣。³⁷王仕雲〈山翁禪師全集序〉見於《百城集》，是其在梅州縣令任內至大埔茶陽謁道忞後所作。序云：

34 清·黃宗羲，〈天嶽禪師詩集序〉、〈平陽鐵夫詩題辭〉，《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371-372。

35 清·黃炳堃，《黃梨洲先生年譜》（《續修四庫全書》第5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下，頁620。

36 清·黃宗羲，〈山翁禪師文集序〉，《黃梨洲文集》，頁370-371。

37 清·趙起士，《（康熙）徽州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卷14，葉52。

辛亥歲，山師以《北遊集》及《布水臺全集》見貽。焚香盥手，受而讀之。玄機妙緒，霏雪裁冰。泛止水之安流，陟無生之遠岸。真足使六地震動，四華普雨者矣。其尤可頌法者，析理則程朱也，抒文則賈董也，譚詩則李杜也。發揚盛德，則唐虞庚歌、商周雅頌也。他若感存悼時、對物興懷，如山月水光，非空非色，機鋒接引，無一不與吾儒立人達人、老安少懷、沂水春風、蔬食曲肱之況味，互相關發。是能以道學正傳，悟波羅真諦者。斯足通之萬世而不變者也。噫！先皇帝其釋迦再世，山師亦宣尼化身歟？迄今龍馭賓天，皇恩億載，山師之教與孔孟偕傳。³⁸

辛亥即康熙十年（1671），《布水臺集》有「全集」一稱，說明此書在其時已被作為全集來編纂。從時間上看，王仕雲所見《布水臺全集》，與黃宗羲所見六冊本（即今存三十二卷本）差異應該不大。

細檢序文，王仕雲主要是從儒家士子的視角來高度評價《布水臺全集》。王仕雲談到，道忞的文字，符合程朱理學之旨，文師賈誼、董仲舒，詩宗李杜，發揚聖德。至於感存悼時、對物興懷之作，皆與儒家立人達人、沂水春風之味相闡發。並認為道忞以道學正傳來體悟佛法真諦，乃孔子的化身，道忞之教與孔孟偕傳。在王仕雲看來，道忞以程朱理學為體，以佛法思想為用，佛教色彩反而十分淡薄。這一看法，很大程度上基於王仕雲深受清初程朱理學的影響。在《布水臺集》的序言之中，從包爾庚等明遺民沿襲下來的「忠孝節義」評價，至王仕雲處轉變為「道學正傳」的評價視角。這不僅僅是由序者身分差異所致，還與請序者道忞在順治、康熙朝的處境變化，以及道忞對政治、思想環境的把握有所關聯，³⁹ 因為所見序言都應當是在道忞的認可下刊示出來。王仕雲序的刊示，反映了道忞認可此序的解讀。

從以上《布水臺集》的流傳、序言來看，應召入宮前，道忞在江南明遺民群體中享有很高聲譽。其威望甚至超過靈岩繼起弘儲，順治九年祁駿佳致信道忞，就有「砥柱法門，為人天表帥者，自是首推和尚，次則繼師

38 清·王仕雲，〈山翁禪師全集序〉，《百城集》，卷首。

39 道忞在順治、康熙朝的處境變化，以及道忞對政治、思想環境的把握，將在下文「《百城集》對《布水臺集》的修訂」第三點「修訂背後的政治暗流」進一步討論。

耳」之讚。⁴⁰入宮後若干年，序言評價視角從「忠孝節義」轉變為「道學正傳」，這與道忞對思想環境變化的把握有關。此外，遠門淨柱（1602-1655）《五燈會元續略》載道忞有「《布水臺文集》十九卷」，⁴¹張立廉〈壽塔銘序〉載道忞有「《布水臺集》《雲僑集》共二十五卷行世」，⁴²由於其中的具體資訊不明，只能留待日後考查。

三、道忞現存別集的版本

以上所述包爾庚、王挺、錢謙益、黃宗羲、王仕雲所見的《布水臺集》分別是一個稿本在不同階段形成的不同樣態，且並未刊印，只在一定的範圍內流傳。至於刊印又留存至今的道忞別集有《北遊集》六卷，《西巖隱集》，《布水臺集》二十卷、三十二卷，《百城集》三十卷，各集皆有不見於他集的作品。它們特點鮮明、版本複雜，具有較高的文獻史料價值。

（一）《北遊集》六卷

現存《北遊集》有三個版本，分別是《徑山藏》本、⁴³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以下簡稱「燕大鈔本」）、羅香林鈔本。經校對後，可知《北遊集》在刊刻、流傳中形成了單行本和《徑山藏》本兩個系統。單行本系統，順治刻本佚後，主要以手抄本形式流傳，有燕大鈔本、羅香林鈔本。《徑山藏》本由單行本刪定而成，康熙二十五年（1686）又有重刻。單行本收、《徑山藏》本不收的作品有十九題三十一篇及五段語錄，其中單行本燕大鈔本有兩篇不見於他載。將三個版本校勘閱讀，方能較為全面地把握《北遊集》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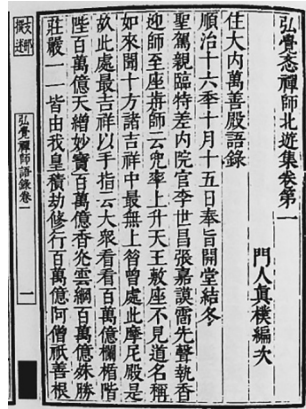
40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本），卷30〈復季超祁居士·其六·附來書〉，頁428。

41 清·淨柱，《五燈會元續略》（《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80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卷4〈寧波府天童寺山翁道忞禪師〉，頁535。

42 清·張立廉，〈壽銘塔序〉，收入清·聞性道、釋德介編撰，《天童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第85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卷7，頁541。

43 《徑山藏》又稱《嘉興藏》，是由明代高僧紫柏真可（1543-1604）發起刊刻的一部大藏經。

1. 《徑山藏》本



圖一 《北遊集》《徑山藏》本書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徑山藏》影印本）

《弘覺志禪師北遊集》（《北遊集》全稱）《徑山藏》本，⁴⁴ 四周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記「支那撰述」、「弘覺禪師語錄卷某」和葉數，下方是墨釘。所用字體是清初較為成熟的扁方體字。⁴⁵ 目次如下：卷一〈住大內萬善殿語錄〉，卷二〈奏對機緣〉，卷三〈奏對別記上〉，卷四〈奏對別記下〉，卷五〈偈、贊〉，卷六〈雜著〉，另兩個鈔本的目次同此。全書由道忞的門人雪樵真樸編次。雪樵真樸，福建漳州徐孝廉，得法於道忞，⁴⁶ 錢光繡稱入京非其志，⁴⁷ 全祖望（1705-1755）以為高節沙門。⁴⁸ 應召入京前後，真樸任天童記室一職，⁴⁹ 故有《北遊集》之編次。

44 清·真樸，《弘覺志禪師北遊集》（6卷本），頁287-30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禪宗全書》第6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徑山藏》第164冊亦影印出版。

45 有關「扁方體字」的概念，見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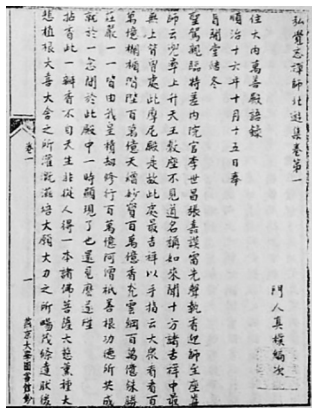
46 清·超永，《五燈全書》（《已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82冊），卷74〈韶州曹谿雪樵真樸禪師〉，頁370。

47 清·錢光繡，《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卷50〈入太白山贈西照、雪樵兩師〉，頁572。

48 清·全祖望，《鮑塘亭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02冊），卷8，頁291。

49 馬元〈曹溪通志序〉：「木和尚詔入對，因事納忠，多所啟沃。觀其語錄，可佐史材。」

2. 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



圖二 《北遊集》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書影（《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本）

《弘覺忞禪師北遊集》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⁵⁰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四周單邊，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單黑魚尾，無行格。版心記「卷某」和葉數，下方是鉛印字「燕京大學圖書館鈔」。

此本是陳垣所見《北遊集》單行本的過錄本之一。1936年春，陳垣在平西某寺發現《北遊集》六卷刻本。這一刻本，卷首載〈敕書二、御札一〉，卷一是〈大內萬善殿語錄〉，卷二是〈奏對機緣〉，卷三、四是〈奏對別記〉，卷五是〈偈、贊〉，卷六是〈雜著〉，末附〈挽大行皇帝哀詞〉，無雕板年月。他據辛丑三月尤侗（1618-1704）已得是集，判斷出版在順治十八年（1661）春。⁵¹1939年，陳垣見《徑山藏》本比單行刻本僅闕〈挽大行皇帝哀詞〉。⁵²燕大鈔本與陳垣所見刻本內容相符，是刻本的過錄本

雪公時在記室，天下事，洞若觀火。」見於清·馬元、釋真樸，《重修曹溪通志》（《中國佛志叢刊》第111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頁23-24。

50 清·真樸，《弘覺忞禪師北遊集》6卷（《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0冊），頁475-509。《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4冊亦影印出版。

51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484。

52 劉乃和，《陳垣年譜》（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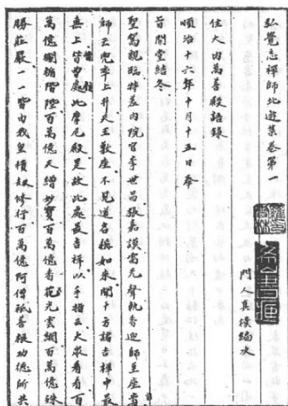
之一。鈔本天頭還記錄了與《徑山藏》本校對後的校語，校記指出燕大鈔本收、《徑山藏》本不收的有：卷一的兩段文字、卷五的十二首詩歌和兩首詩序、卷六的兩篇雜文及〈大行皇帝哀詞〉十首。《徑山藏》本所闕不僅〈大行皇帝哀詞〉，故鈔校語應非陳垣所作。

燕大鈔本有十四題二十六首詩、一篇詩序、一篇贊文、一篇引文、一篇跋文、一篇佛事、五段語錄不見於《徑山藏》本。其中，〈贈萬善監院名馳大德〉、〈贈廣濟德光上人〉不見於現存道忞的其他著述，其內容有助於補充名馳、德光二僧資料，以及瞭解順治十六、十七年間順治宮廷佛教環境之一隅。〈贈萬善監院名馳大德〉一詩，時名馳任萬善殿監院，監院是禪宗六知事之一，則名馳應是禪師。此詩記述名馳在順治帝身旁，宮內外溜流都賴名馳提攜，並以「國師水碗」公案來諷刺不解佛意而註佛經的「紫璘供奉」所為。從「會看芳名馳白社，紫璘謾說著當時」一語來看，時宮中似有「紫璘供奉」行徑。據《律宗燈譜》，名馳本延禧寺僧，是清初律學愍忠系振寰照福（1634-1699）的剃度師。⁵³〈贈廣濟德光上人〉一詩，廣濟德光即廣濟寺德光湛祥（1613-1677）律師，與照福同為清初律學愍忠系。⁵⁴詩云「不仗毘耶香積國，空擎一盞馱諸方」，可見湛祥在宮中弘揚戒律的具體作風。於此二詩，亦可知道忞與名馳禪師、湛祥律師均有一定的交往和瞭解。雖然其他作品也見於他集，但唯《北遊集》明確了順治宮廷的寫作地點，以此有助於瞭解道忞與宮廷中人的聯繫與活動。例如，〈示公黻明居士〉雖亦見於《弘覺忞禪師語錄》，但唯《北遊集》表明此文作於順治宮廷。公黻明居士，即納喇明珠。由此可知，道忞與明珠相識於順治宮廷。

53 清·源諒，《律宗燈譜》（《大藏經補編》第 22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頁 752。

54 有關德光湛祥律師的介紹，詳見清·天孚湛祐，《弘慈廣濟寺新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44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卷中，頁 132-138。

3. 羅香林鈔本



圖三 《北遊集》羅香林鈔本書影（《禪門逸書續編》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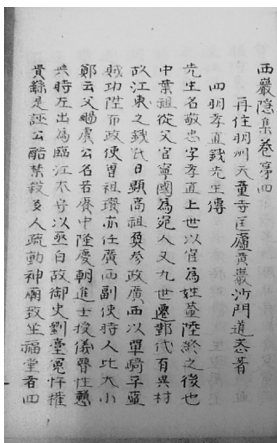
1956 至 1968 年間，羅香林抄錄香港大學藏《北遊集》，並將鈔本贈予了羅博平。1970 年，藍萼洲將此鈔本影印出版。⁵⁵ 今不見香港大學藏本，故在此介紹羅香林鈔本。鈔本用紙每頁十行，每行二十五字，行格清晰。有白文方印「希山書藏」、朱文方印「羅香林印」，皆羅香林藏書印。此本收錄篇目與燕大鈔本一致，只是卷一約脫十二頁，卷五脫一頁。兩種手抄筆跡外，書中又有第三種筆跡：一是在異體字右作通行字，有 25 處。二是在一字右作校字，但依據不明，有 15 處。三是據《徑山藏》本在一字右作校字，有 34 處。即羅香林鈔本經二人抄寫彙集，後之藏者以《徑山藏》本和他本校讀此書。

《（民國）新修大埔縣志》錄有一個《徑山藏》的重刻本。⁵⁶ 此本另錄奏疏，「奏對機緣」作「奏對機語」，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道忞的弟子、法孫重新刪刻的《北遊集》另一《徑山藏》本。

55 清·木陳道忞，《北遊集》（《禪門逸書續編》第 10 冊，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頁 1-164。

56 劉鐵超修、溫廷敬等纂，《（民國）新修大埔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 22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卷 35，頁 635。

(二)《西巖隱集》



圖四 《西巖隱集》日本鈔本書影

(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掃描)

藏於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抄本，僅存卷三至卷七，卷三缺首葉。封面題「西巖隱集全」，或原是全本，後有遺失。正文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新纂禪籍目錄》著錄為：「《西巖隱集》五卷，清木陳道忞著，寫本」，見於京都大學《禪苑清規總要》內。⁵⁷

從字體來看，現存《西巖隱集》當出自日本抄手。書中，「釋」作「釈」，「釈」乃和制俗體字。如卷四〈四明孝直錢先生傳〉中「乃得旨原釈」，卷六〈自贊〉其三十二中「釈門慶喜」等。又「實」作「実」，「実」是「佚存文字」。⁵⁸如卷四〈四明孝直錢先生傳〉中「天実鑒之」，卷六〈釋迦文佛贊〉中「示実還宜上妙輪」等。書中還大量存在「發」作「発」、「經」作「経」、「勞」作「労」、「營」作「営」、「輕」作「軽」的情況。經與《百城集》的編年繫地對照，已知現存《西巖隱集》收錄最晚的作品是康熙六年的〈臨海新興法輪寺募緣疏〉，即此書在康熙六年或稍後成集。

57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日本：佛書刊行會，1962），頁 231。

58 和制俗體字、佚存文字皆為日本漢字，見於何華珍，〈俗字在日本的傳播研究〉，《寧波大學學報》24.6(2011.11): 52。

《西巖隱集》的顯著特點是，收有不見於他集的作品共十題十四篇，且贊文末標注了大量不見於他集所載的請贊者。〈百城集自序〉言「西巖隱集」收順治十四年道忞再主天童至順治十六年北上入宮前的作品，而現存《西巖隱集》雖收這一部分，也收有順治四年（1647）至康熙六年九篇作品。

（三）《布水臺集》二十卷



圖五 《布水臺集》二十卷清順治刻本書影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電子文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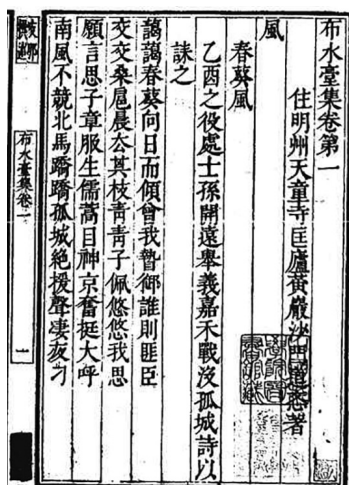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清順治刻本，四周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記「支那撰述」、「布臺集卷某」和葉數，下方是墨釘。字體是清初較為成熟的扁方體字。卷末有「虞伯馨印分記」章。《布水臺集》二十卷本、三十二卷本均是按照《徑山藏》之《又續藏》的版式刊刻，⁵⁹ 但有別於官版刻藏的「入藏」文本。⁶⁰ 本書收錄包爾庚、王挺二序，以雅、

59 二本版式與《又續藏》統一版式相同。《又續藏》的統一版式，見於韓錫鐸，〈《嘉興藏》各本異同略述〉，《文獻》2008.2(2008.4): 182。

60 《徑山藏》編藏動機出於宗教信仰，信徒親身參與或助行，以積功累德。見於法幢，〈「大藏經」的再認識〉，收入吳疆、王啟元編，《佛法與方法：明清佛教及周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頁158。

碑記、傳、塔銘墓誌、狀、遊記、序、引、疏、啟、跋、說、雜記、祭文、贊、詩、尺牘等文體分卷編次。目次載卷二十收錄〈後序〉，但正文不見此序，而是王挺序被題以「後序」之名次於包爾庚序。已知今存二十卷本收錄最晚的作品是作於順治十四年的〈靈隱嵩居如公塔銘〉、〈辨訛說〉，冼玉清認為二十卷本「似為己亥前刻」，⁶¹ 信然。此本是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刻，收有不見於他集的作品共三十八題四十一篇。⁶²

(四)《布水臺集》三十二卷



圖六 《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清康熙刻本書影（《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有藏。清康熙刻本，四周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記「支那撰述」、「布水臺集卷某」，次葉數，下方墨釘。字體是清初較為成熟的扁方體字。收錄錢謙益、包爾庚二序，也是以文體分卷編次。

61 冼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頁 130。

62 另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布水臺集》20 卷，3 冊，屬（日）中村敬字舊藏。此書因未寓目，考述暫闕，待日後考察。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中科本」）、⁶³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臺北本」）⁶⁴ 均經道忞同時代僧人收藏。中科本有朱文方印「大淵」，大淵即道忞弟子大淵本齋（1625-1695）。⁶⁵ 臺北本有朱文方印「寄雲」、「徹凡印」，徹凡，即《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所收「徹凡禪人乞題〈牧牛圖〉」的「徹凡禪人」。⁶⁶ 由於印章顯示的是「徹凡」，清楚不誤，所以《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中的「澈凡」當是誤記。⁶⁷ 值得注意的是，二本版刻並非完全相同，且中科本有挖改。情況如下：第一，二本相同斷板達 65 處以上，集中在前二十卷，臺北本斷痕較小、中科本斷痕較大，這部分版刻二本大體相同，知中科本前二十卷刷印在後。第二，在卷三十〈復神鼎僊長老〉、〈復幻樞濟書記〉二文之間，中科本還收錄了〈與素山義長老〉一文，而臺北本不收。至少從卷三十第六葉至十八葉，二本的版刻完全不同，即這部分存在兩個不同的版刻。第三，中科本錢謙益序的句末記「歲在己亥春王二月望日」，僅署「槃譚謹書」，未見序者署名，應是挖去原「錢謙益」署名而成。而臺北本序末無紀年，署有「海印弟子虞山錢謙益槃譚謹書」。第四，二本至少存在十七處異文。⁶⁸ 從中科本前

63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 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3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1-288。此本缺卷 5 第 21、22 葉。

64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 卷本），頁 309-43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禪宗全書》第 98 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徑山藏》第 212 冊均據臺北本影印。

65 清·超永，《五燈全書》，卷 74〈雲間華亭瑞應大淵本齋禪師〉，頁 372。

66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 卷本），卷 15〈徹凡禪人乞題〈牧牛圖〉〉，葉 4。

67 清·木陳道忞，《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崇禎十二年」條載「為澈凡禪人題〈牧牛圖贊〉」（頁 343）。

68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收錄的《布水臺集》，前言稱以臺北本為底本，中科本為校本進行整理，但校勘記不見二本校語。茲以中科本為底本，列異文如下：卷 4 第 5 葉第十三行，中科本作「拜首」，臺北本作「拜手」；卷 6 第 4 葉第十五、十六行，中科本作「張大覺」，臺北本作「張天覺」；卷 7 第 5 葉第十六行，中科本作「繼今乙亥」，臺北本作「繼今丁亥」；卷 11 第 2 葉第十六、十七行，中科本作「可卜矣」，臺北本作「可十矣」；卷 12 第 8 葉第四行，中科本作「卒隸師之義」，臺北本作「卒隸師之議」；卷 13 第 14 葉第八行，中科本作「穀湊」，臺北本作「輻輳」；卷 14 第 3 葉第三行，中科本作「夏福秋嘗」，臺北本作「夏禴秋嘗」；卷 16 第 18 葉第十一、十二行，中科本作「亨其齋」，臺北本作「享其齋」；卷 18 第 4 葉第十行，中

二十卷刷印在後、錢謙益序末署名遭挖改的情況來看，相較而言，中科本的結集很可能是在臺北本之後。《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存在「中科本」「臺北本」的版刻差異，說明《又續藏》中同名同卷的書也存在版刻不同的情況，之後重刻的部分版本不復原本之舊但仍屬《又續藏》。可見，《徑山藏》之《又續藏》的刊刻情況較為複雜。這說明不能貿然將某書的《又續藏》本作為一個單一的版本，而須將某書現存《又續藏》各本作一比對，方能確定此書的《又續藏》版本情況。

經與《百城集》的編年繫地對照，《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收錄較晚的作品是康熙六年的〈臨海新興法輪寺募緣疏〉、〈聖月錢居士贊〉，知此本在康熙六年或稍後刊刻。除了崇禎十四年（1641）〈題畫〉、〈題入山圖〉列在順治十年（1653）外，此本的詩歌大致是按照從明崇禎九年（1636）至清康熙三年（1664）的撰寫時間的先後來排序的。藉此編次特點，可為部分創作時間不明的詩歌進行繫年。

（五）《百城集》三十卷

現存《百城集》三十卷有清康熙刻本、民國王培孫鈔本兩個版本，鈔本自刻本而來。《百城集》最顯著的特點是，目次每題之下都標註了寫作的時間和地點，但其中至少有十六篇作品的編年或繫地有誤。

科本作「鳥啼花笑更春風」，臺北本作「鳥啼花更笑春風」；卷 19 第 14 葉第十六行，中科本作「神鼎禮長老請」，臺北本作「天童禮長老請」；卷 19 第 16 葉第十二行，中科本作「龍牙堯長老請」，臺北本作「龍牙住長老請」；卷 20 第 14 葉第六行，中科本作「車轆轤」，臺北本作「車鄰鄰」；卷 23 第 10 葉第十一行，中科本作「鳳之梧」，臺北本作「鳳之梧」；卷 28 第 2 葉第九行，中科本作「兄之不臯」，臺北本作「兄之不之臯」；卷 30 第 12 葉第六行，中科本作「不亦善乎」「旨否」，臺北本作「不一善乎」「旨不」；卷 30 第 13 葉第二十行、14 葉第一行，中科本作「拂袖他往」，臺北本作「拂袖它往」；卷 30 第 14 葉第一行，中科本作「銅駝」，臺北本作「銅鉞」。

1. 清康熙刻本



圖七 《百城集》三十卷清康熙刻本書影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電子文檔)

此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四周雙邊，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記「百城集」、「卷某」和葉數，白口，字體是清初較為成熟的方體字。收錄王仕雲〈山翁禪師全集序〉、錢謙益〈百城集序〉、⁶⁹道忞〈百城集自序〉、損岩明堅〈募刻弘覺禪師《百城集》疏引〉。全書以文體分卷，收錄最晚的作品是康熙十三年〈印蘊自序〉、〈夢隱道人自撰藏真塔銘〉、〈復位中符禪師〉三篇。道忞自序云：「於是校讎既定，總而名之曰《百城集》者，志遊歷也。」則此集在康熙十三年道忞示寂之前編成，本年或稍後刊刻完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經陳垣披露後，為諸家所知，此本缺卷五目次、卷二十二第十三葉。上海圖書館藏本有「王培孫紀念物」朱文方印，屬王培孫舊藏，此本則鮮為人知，缺卷二十五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頁。將兩個藏本結合起來，方可見康熙本《百城集》的全貌。

《百城集》目次在每題之下都標註了寫作時間和地點，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歷來作家重編年而輕繫地，編年意識自覺強烈，繫地意識相對淡

69 《百城集》康熙刻本的目次「序引」下缺「錢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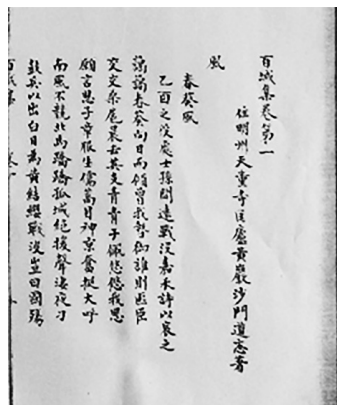
薄，⁷⁰而道忞編年、繫地並重的編集觀念尤其難得。經筆者考證，其中有十六篇作品的編年或繫地有誤。為了《百城集》更好地被研究使用，茲將考證略列於下：〈龍池禹門幻有傳和尚傳〉所繫「崇禎九年」是「崇禎十年」之誤，據《山翁忞禪師隨年自譜》（以下簡稱《自譜》）「崇禎十年」條載「三月，刪刻《龍池傳祖語錄》，仍志其生平之大者為傳」。〈南海普陀山梵音庵釋迦文佛真身舍利碑〉所繫「崇禎九年」是「崇禎十年」之誤，據該文記「今上丁丑春仲」，丁丑即崇禎十年。〈義僕傳〉〈故兄知廣西平南縣事文林郎亦采公行狀〉所繫「崇禎十一年」是「崇禎十年」之誤，據《自譜》「崇禎十年」條載「是冬，居里齋為先兄亦采公作行狀。傷世高官重祿，而不盡瘁其君，復作《義僕進寶子傳》」。〈告以直禪師文〉所繫「崇禎十二年」是「崇禎十一年」之誤，據該文記「去冬弟歸省」，而道忞於崇禎十年歸省嶺南。〈與臺山梅庵宜禪師（廣陵一別）〉所繫「崇禎十四年」是「崇禎十六年」之誤，據該文記「去秋忽接老人訃音」，而密雲圓悟於崇禎十五年（1642）七月示寂。〈復古南牧和尚（承兄推挽）〉、〈與春曉紀海憲（客秋尋教言）〉所繫「順治三年」是「順治四年」之誤，據二文均言「去歲秋謝天童」事，而道忞於順治三年（1646）七月退天童。〈贈董山人〉所繫「順治五年」是「順治六年」之誤，據該文記「己丑夏，言如董君為釐革山門，居然宅中圖大矣，賦以贈之」，己丑即順治六年（1649）。〈募建大能仁寺鐘樓引〉所繫「順治六年」是「順治七年」之誤，據該文記「已于今歲庚寅之八月吉日辛卯鳩工」，庚寅即順治七年（1650）。〈復神鼎雲外澤侄禪師（聖賢不作）〉所繫「順治六年大能仁」是「順治十年維揚」之誤，雲外行澤（1607-1654）來信說自己去秋移居神鼎，故道忞回信作此文，而行澤於順治九年入主神鼎。〈復龍池萬和尚（道峰阻龍池）〉所繫「順治八年」是「順治九年」之誤，據該文所載時道忞已從永嘉歸還。〈壽愚庵三和尚序〉所繫「順治十六年」是「順治十五年」之誤，據該文記「今秋戊戌師且登六旬」，戊戌即順治十五年（1658）。〈重修笑岩祖塔記〉所繫「順治十六年」是「順治十七年」之誤，據該文記「今順

70 王兆鵬，〈從「年譜」到「編年繫地譜」——重建作家年譜的理念與範式〉，《文學評論》2021.3(2021.3): 17。

治十七年玄水杲與憨璞聰共捐貲」。〈叔度汪先生七十壽序〉所繫「康熙十年」是「康熙八年」之誤，據該文記「今康熙歲在己酉為君兄叔度先生七袞攬揆之辰」，己酉即康熙八年。〈挽介子黃居士〉所繫「五磊」是「廣潤」之誤，黃毓祺卒於順治六年三月，故繫年為「順治六年」不誤，但道忞時主廣潤。以上十六誤，大部分是沒有利用原文的時間座標而致，且占全書比例很小，《百城集》的編年繫地信息仍十分可靠。相對於編年，繫地信息反而不易出錯，這對於準確把握道忞生平行蹤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與道忞法嗣天嶽本晝（1621-1706）交好的黃宗羲，曾參與了《百城集》的刪定工作。康熙八年，因黃宗羲未完成《布水臺集》的刪定，之後道忞只好自為刪定而成《百城集》。康熙二十一年（1682），黃宗羲再至平陽，時平陽住持本晝請黃宗羲刪定《百城集》，以兌前諾，但未果。康熙二十二年（1683），本晝親至黃竹，再申文集刪定事，有〈寄黃征君梨洲頃以先師《百城集》屬訂〉⁷¹一詩責黃宗羲爽約。山曉本晝派人到黃竹，亦有責言。夏，黃宗羲終於刪定了《百城集》，並撰〈山翁禪師文集序〉一文。可見，《百城集》之後還有一個經黃宗羲刪定的節本，今已不存。

2. 民國王培孫鈔本



圖八 《百城集》民國王培孫鈔本書影（上海圖書館藏本照片）

71 清·天嶽本晝，《直木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2〈寄黃征君梨洲頃以先師《百城集》屬訂〉，頁68。

此本藏於上海圖書館，是王培孫藏清康熙刻本的過錄本。王培孫（1871-1952），上海南洋中學校長，教育家、藏書家、版本校勘學家，曾校輯明末清初詩僧見曉讀徹（1588-1656）《南來堂詩集》。此本首載王培孫識語，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無行格，版心記「百城集」、「卷某」和葉數。據王培孫識語，1938 年他購得《百城集》清康熙刻本，範師⁷²囑為抄錄副本。因中日戰爭爆發，兩年後，他才在上海大同坊寓廬抄錄完畢。但《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已有的篇目，鈔本僅存目，而不再錄文。

四、《布水臺集》與諸集的關係

順治、康熙年間，《布水臺集》主要以稿本形式在文人間流傳，當時《禪餘集》、《雲儒集》、《西巖隱集》、《北遊集》、《停梅集》、《百城集》等也在成集、出版、流傳中。現存道忞別集有《北遊集》、《西巖隱集》、《布水臺集》二種、《百城集》，其中《西巖隱集》、《布水臺集》二種與順康年間流傳的同名別集並非完全一致，這一點已見上文論述。下文將要進一步討論流傳、現存的道忞別集之間的主要關係。在道忞的別集中，《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文本。理清《布水臺集》二十卷本、三十二卷本與諸集的關係，是準確把握道忞別集版本源流的關鍵。筆者將《布水臺集》二種與現存其他文集比對後，得出以下結論。

（一）二十卷本是《百城集》來源之一

據〈百城集自序〉，《布水臺集》收錄崇禎十二年道忞出太白山至順治九年將歸匡廬期間的作品。野口善敬指出，《布水臺集》二十卷本的內容以順治九年以前為多，順治十年以後甚少，這與〈百城集自序〉所言「《布水臺集》」相近。⁷³這一結論初步說明了《布水臺集》二十卷本與《百城集》的關係，只是二十卷本收錄崇禎十二年前、順治九年後作品的情況還須釐清。

經比對、考證，可知《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所收崇禎十二年前（不含

72 「範師」是王培孫在識語中提及的人物，具體為何人，待考。

73 （日）野口善敬，〈關於木陳道忞的著述〉，頁 499-500。

崇禎十二年)的作品有：崇禎三年(1630)一篇(〈禪燈世譜序〉)、崇禎九年四篇(〈送元白可公出天童〉、〈送鹽梅鼎禪師住南嶽〉、〈赤水集序〉、〈南海普陀山梵音庵釋迦文佛真身舍利碑〉)、崇禎十年四篇(〈龍池禹門幻有傳和尚傳〉、〈義僕傳〉、〈故兄知廣西平南縣事文林郎亦采林公行狀〉、〈為序禪人募修靜室養母引〉)、崇禎十一年(1638)兩篇(〈鳴鼓錄序〉、〈告以直禪師文〉)，共十一篇；收錄順治九年後(不含順治九年)的作品有：順治十年一篇(〈見聞雜記(有一士人)〉)、順治十三年一篇(〈見聞雜記(海岸端伯黃公)〉)、順治十四年兩篇(〈靈隱嵩居如公塔銘〉、〈辨訛說〉)，共四篇。《布水臺集》二十卷本與〈百城集自序〉所言的「《布水臺集》」至少存在十五篇作品的差異，但對於全書而言並不多。雖然收有順治十三、十四年的作品，但《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未收有關《雲僑集》的篇目，這說明二十卷本與〈百城集自序〉所言「《布水臺集》」的分期結集性質十分一致。

《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是一個相當接近〈百城集自序〉中「《布水臺集》」的文本。可以近似地說，《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是《百城集》的來源之一。

(二) 三十二卷本來自於《禪餘》六集

至於同名異卷的三十二卷本《布水臺集》，並不是在二十卷本的基礎上簡單增加篇目而形成的。除了說明《布水臺集》的收錄範圍外，〈百城集自序〉還談到，《雲僑集》收錄順治十一至十三年(1654-1656)道忞弘法青州、寓居揚州的作品，《西巖隱集》收錄順治十四年道忞再主天童至順治十六年北上入宮前的作品，《北遊集》收錄順治十六、十七年道忞在宮廷弘法的內容，《停梅集》收錄康熙二至四年(1663-1665)道忞往來於金粟、龍池的作品，《禪餘集》則未明言作品的時間。將《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的篇目與上述五個文集的收錄範圍作一對比，⁷⁴可知三十二卷

74 現存《布水臺集》(20卷本)接近於〈百城集自序〉中的「布水臺集」，現存《西巖隱集》收有〈百城集自序〉中「西巖隱集」的內容，故在此將《布水臺集》(32卷本)與二本對比。

本收有《布水臺集》二十卷本 275 題 373 篇、⁷⁵《雲僑集》33 題 65 篇、《西巖隱集》60 題 166 篇、⁷⁶燕大鈔本《北遊集》50 題 66 篇、⁷⁷《停梅集》54 題 67 篇。〈百城集自序〉述及的五個集子都能在《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中找到眾多的對應篇目，這說明《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是至少由五個集子合編增刪而成的。故野口善敬所認為的「三十二卷本《布水臺集》是二十卷本和《西巖隱集》合編而成」⁷⁸的結論有待再討論。《禪餘集》與其他五集性質相似，也應是《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的來源之一。

康熙十年，王仕雲序稱「布水臺集」為「布水臺全集」。現存《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結集於康熙六年或稍後，王序「全集」之稱，正是《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由諸集合編而成的佐證。

（三）三十二卷本增刪形成《百城集》

《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由《禪餘集》等六集合編增刪而成，但〈百城集自序〉卻說六集成成的是《百城集》。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源自於〈百城集自序〉僅涉及《百城集》的形成結果，而未說明形成的過程。

《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結集於康熙六年或稍後，而《百城集》新增篇目大部分是康熙六年之後的作品。《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不收、《百城集》收的作品共有 158 題 236 篇，其中康熙六年前的僅有 17 題 23 篇，康熙六年後的有 141 題 213 篇，後者占了《百城集》新增作品九成。而《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收、《百城集》不收的作品高達 268 題 431 篇。另外，在《百城集》與《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皆收的 25 題組詩中，每題篇數《百城集》皆少於《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例如，《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收〈袈裟吟〉十一首、〈次答趙將軍玉韻〉十四首、〈和靈澄禪師《山居詩》〉十一首，《百城集》分別收十首、八首、十首等。由此可見《百城集》對《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的刪減痕跡。可見，《百城集》應是在《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的基礎上新增康熙六年至十三年（1667-

75 現存《布水臺集》（20 卷本）共有作品 314 題 414 篇。

76 現存《西巖隱集》共有作品 74 題 182 篇。

77 《北遊集》卷 5、卷 6 專收詩文共 78 題 95 篇。

78 （日）野口善敬，〈關於木陳道忞的著述〉，頁 499-500。

1674) 的 141 題 213 篇作品、刪去康熙六年前的 268 題 431 篇作品而形成的。

為了略窺《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到《百城集》的篇目增刪考量，我們須關注《百城集》對康熙六年前（不含康熙六年）作品的增刪情況。⁷⁹在《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基礎上，有關康熙六年前的作品，《百城集》增 15 題 21 篇、刪 266 題 429 篇。重編新集，刪增篇目，這一文本處理本身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難以精確把握。因此，筆者只能盡可能抓住新、舊集篇目差異突出的部分進行討論。

經過對比，二集篇目差異較為突出的是：

一、順治八、九年道忞弘法嬰難的相關作品，《布水臺集》收錄 28 題 59 篇，《百城集》僅收 10 題 29 篇。其中，道忞與耿應衡交往的記載，⁸⁰《布水臺集》收錄 10 題 12 篇，《百城集》僅收 3 題 4 篇。至於體現道忞在江南叢林明遺僧領袖地位的記載，《布水臺集》收錄 18 題 47 篇，《百城集》僅收 7 題 25 篇。《百城集》隱沒了耿應衡是道忞所主寺院的大護法，將二人長期的詩文之交、密切往來遽定為普通的僧俗關係，且大大弱化了道忞的明遺僧身分。

二、《百城集》刪去道忞心懷故明、悼念崇禎帝、與明遺民遺臣交往的作品共 20 題 35 篇，所呈現的遺民生活色彩有所削弱。所刪作品涉及道忞與黃毓祺、高斗樞（1594-1670）高宇泰父子、胡周肅、黃日芳、祁鴻孫（1611-1656）、孫自修、胡介、陳濟生、董稚升、馬采臣、王挺、王瀚（1607-1672）、錢光繡、梅之煥、周錫康等明遺民的交往，以及曾為明遺民稱道的《新蒲綠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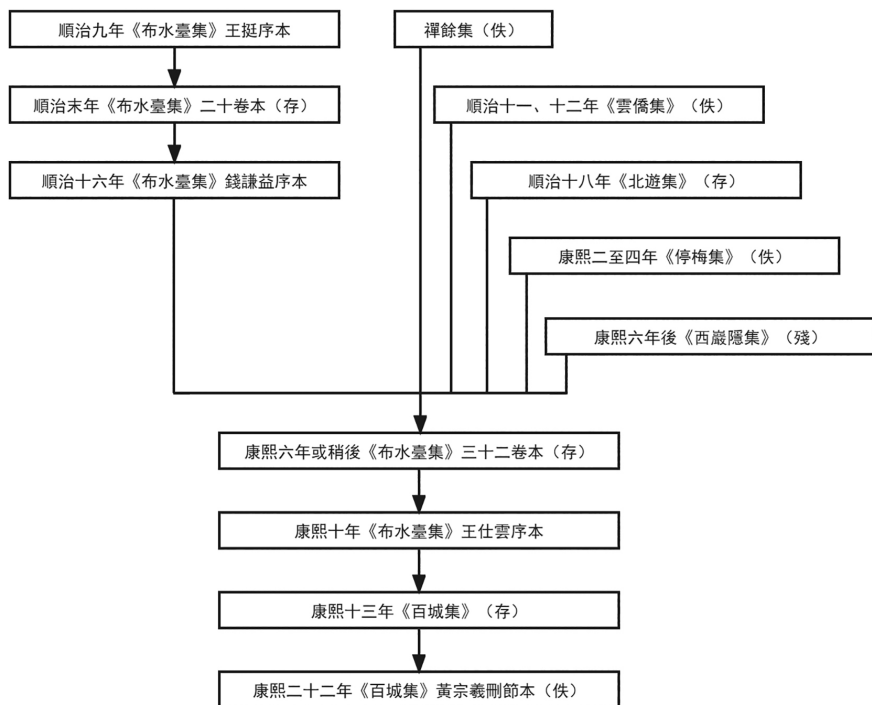
三、《百城集》增加道忞與清廷朝堂官員嚴沆（1617-1678）、楊雍建

79 《布水臺集》（32 卷本）結集於康熙六年，形成於康熙十三年，《百城集》對前者的篇目改動自然包括康熙六年至十三年的篇目增加，故不需對這一時期的篇目增加進行討論。

80 道忞與耿應衡的密切往來，是導致道忞入獄的直接原因。順治八年九月，耿應衡被參革職。原參條款言耿應衡過奉道忞、繼起弘儲為彌勒下生，率諸僚屬鄉紳禮敬，立薄廣募，聚財入己。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427。

(1631-1704)、納喇明珠交往的作品 5 題 7 篇，顯示了道忞對清廷堂廟官員的讚賞、認可與感激之情。例如，康熙三年，道忞賦詩贈嚴沆，有「父申公又子申公，世掌絲綸足媲美」之語。⁸¹ 以上三點，反映了《百城集》存在弱化遺民情緒、⁸² 加強擁護新朝的修訂考量。

《百城集自序》的表述省略了《禪餘集》等六集先形成《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再由《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編成《百城集》的環節，故有六集成《百城集》之說。至此，道忞各別集之間的關係逐漸明晰，茲將《布水臺集》流傳和現存別集的源流關係圖示如下：



圖九 木陳道忞流傳、現存別集的源流關係圖

81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 4〈顯亭嚴給諫求言，書以贈之〉，葉 6。

82 現存《百城集》中仍有不少突顯遺民情緒的篇目，只是相對於《布水臺集》（32 卷本），遺民情緒有所削弱，而非被完全取代。

五、《百城集》對《布水臺集》的修訂

從上文的論述，可知《百城集》出自於《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這是從篇目差異分析而言的，但二本的關係並不止於此。筆者以《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為底本，其他現存別集為參校進行校勘，發現同一篇目的異文主要分布在《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與《百城集》兩者間。也就是說，從《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到《百城集》並非簡單的篇目增刪，還包括了具體文字的修訂。下面將通過兩處修訂來討論二本文字差異所反映的意義差異，並初步探析修訂背後的深層原因。

（一）文字修訂

第一處，改「首陽」為「營丘」。〈與冰庵張居士〉在《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有「春杪將吊東海之風、首陽之跡於臨淄、即墨之間」的表述。《百城集》錄此文時，將「首陽」改成「營丘」。首陽，相傳為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采薇的隱居之地，原句「吊首陽之跡」即憑弔古遺民餘跡，暗含道忞的遺民僧身分。時道忞以遺民僧身分活躍於江南一帶，故有「吊首陽之跡」一語。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⁸³周武王平定商朝後封姜尚於此。「吊營丘之跡」即憑弔姜尚助力武王伐紂、建立新朝的遺址，與原句相較，反有刻意顯露道忞擁護新朝的意味。此文是順治十一年（1654）初道忞赴青州大覺寺之前寫給張立廉的書信。

第二處，不主《春秋胡氏傳》的「華夷觀」。《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收錄〈見聞（其十五）〉，文中「《傳》曰『夷狄之有君』」，《百城集》改為「《傳》稱『外國知有君長』」。《傳》指《春秋胡氏傳》。《春秋胡氏傳》卷三十二：「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⁸⁴《傳》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原意，即楊樹達《論語疏證》所言「夷狄還有賢明之君，不像中原諸國卻沒有」。⁸⁵道忞在文中引此句，來讚揚四夷館的回回使者知有本

83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2〈齊太公世家第二〉，頁1480。

84 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32，頁497。

85 楊伯峻，〈八份篇第三〉，《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4。

國君主。《百城集》將句中的「夷狄」改為「外國」，一詞之差反映了道忞不主《春秋胡氏傳》在「華夷之辨」問題上的傳統觀點。並且，他不再遵奉胡氏傳的權威，將傳文的「之有君」，改為「知有君長」，以牽合文意。可見，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批評《春秋胡氏傳》前，⁸⁶民間已有人在迎合官方的思想，並不完全遵從此書的意見。另一方面，《百城集》不少詩文也有「夷」、「狄」的文字，⁸⁷但這些語詞並不在《春秋胡氏傳》「攘夷狄」、「華夷之辨」的思想體系中，故沒有更改或刪去。

順治十六年九月道忞應召入宮，次年有諷刺明遺民「堪笑首陽清餓客，采薇擬欲療荒脾」詩句。⁸⁸康熙九年（1670），他撰〈從周錄序〉批判「託首陽以自高」者，以為「安事首陽清餓，而為聖人之所不為哉」？從表面上看，以上兩處文字修訂，以及前文所述《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到《百城集》的篇目增刪考量，似與道忞從「故國派」到「新朝派」的立場轉變不無關係。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簡單，詳見以下論述。

（二）文本修訂與立場轉變關係

在此，須注意的是，所謂的「故國派」、「新朝派」之說是儒家忠孝節義觀念的產物，而並非佛門應有之物。⁸⁹實際上，道忞入宮是獲得了密雲圓悟法嗣之一、道忞師弟牧雲通門的支持。並且，見月讀體（1601-1679）在康熙三年還造訪道忞，二人相談甚歡。

順治十七年，牧雲通門致信道忞，信首小註云道忞「時在都中」，此信全文如下：

自法駕北上，時復懷念，不得一信。正月望後，圓知、潛輝二上首過門，獲覲到京法語，並悉道體平安為慰。弟伏思聖明天子顯揚佛法，

86 有關康熙、乾隆時期對《春秋胡氏傳》的批評，詳見康凱淋，〈論清初官方對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的批評〉，《漢學研究》28.1(2010.3): 295-323。

87 如〈韓城雅〉有「率服島夷」、〈烈皇帝薦嚴疏〉有「蠻夷貊狄」之詞，這也說明《百城集》並非康乾時期重印挖改的版本。

88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本），卷4〈和天封佛慈祥蜜蜂頌·其五十三〉，頁326。

89 前文王挺序中，就有釋家奉出世法、與世無涉之說。

實千載一時也。惜先師門下屈指無幾人，乃化者化，老者老，而弟之抱病，更為可憫，比來一飯三遺矢矣。故先師之法道全系于吾兄一人。時節因緣，難遭難遇。先師之語得入龍藏，在是五燈之續，匡正在是，臨濟之真燈焜耀在是，諸祖之正法眼流通在是，法門之流弊振刷在是。望吾兄念其大者，勿速南轅。天童道場，英賢濟濟，可弗為念。法幢高建於都門，直待事畢還山，則弟雖臥疾，與有榮施焉。脫未即死，重過玲瓏岩畔，與吾兄一談夙昔，殊快事也。臨楮神往，不盡依依。⁹⁰

晚明高僧的隕落、明末清初的戰亂、叢林獅蟲的橫肆等，給清初佛門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通門認為，順治帝顯揚佛法，實佛門振興千載難遇的大好時機，「時節因緣，難遭難遇」。道忞此番入宮，助力圓悟語錄入藏，使臨濟真燈照耀，振刷法門流弊。通門極力勸說道忞不要那麼快回山，希望他在都門高建法幢，那麼自己也與有榮施。以此書信，觀照姚範《援鶉堂筆記》所載：沐塵盛輿從謁之，（通門）閉門不見，曰：「我方出世，子入世，奚相見為？」⁹¹可知，道忞入宮後受通門唾棄的記載，乃乾隆文士因循政治風氣的無據臆測。

此外，康熙三年，道忞作〈喜華山見和尚惠顧東山，賦謝〉。⁹²華山見和尚，即華山見月讀體。讀體至東山訪道忞，二人晤面，道忞喜出望外，賦詩紀之。詩云：「為憐說食事蒸沙，高揭進幢老倍加。深入般舟常在定，切操梵行久如家。會將五部成完部，疊取千華作寶華。何幸移筇勞我顧？戒香襲得勝天葩。」顯然，讀體並沒有因應詔入京的行徑而不待見道忞或者因此交惡，否則二人晤面就絕對不會是「一顧」「一喜」了。如此一來，王士禎《居易錄》所載：康熙乙巳，⁹³予謁花山見月律師，師蹙額語予云：

90 清·牧雲通門，《古南澹翁老人懶齋遺稿》（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卷3〈與天童木陳和尚〉。

91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續修四庫全書》第1149冊），卷49，頁165。

92 《百城集》將〈募建東山翼善禪寺大雄寶殿疏〉、〈到白門掃東山海舟慈、寶峰瑄二祖塔〉、〈募建東山翼善禪寺大雄寶殿疏〉皆繫於康熙三年、作於東山。〈喜華山見和尚惠顧東山，賦謝〉一詩在《布水臺集》（32卷本）中，前後作品皆作於康熙三年入居東山翼善禪寺期間。則此詩作於康熙三年道忞在東山時期，可無疑義。

93 康熙乙巳，即康熙四年。

「渠胸中面上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⁹⁴ 王士禎筆下讀體對道忞的這一批評，應有重新檢視的必要。

由此可見，道忞自順治宮廷返回江南後，並未受到原叢林僧友的孤立，反而很大可能因振興佛門之功而受到歡迎。例如，爾瞻達尊（1608-1663）在寫給道忞的書信中就有「欣聞和尚應詔還山，法門大幸」⁹⁵ 之語。在清初佛門凋敝、危機四伏的現實情況下，擺在一名僧人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振興叢林、拯救佛法。從以上材料來看，當時包括道忞在內的弘法僧人，應當有很大部分並不在意所謂的「故國派」、「新朝派」之分。

道忞入宮一事，在以振興叢林為首要的僧人群體⁹⁶ 中應該沒有受到苛責，反而是鼓舞了一群想要積極弘法的有為僧徒。⁹⁷ 順治十七年，費隱通容在寫給隱元隆琦（1592-1673）的信中提到：「幸得今上國主隆重臨濟，自古以來無比。屢召善知識，如報恩玉公、天童木公及法孫憨璞公。相聞亦欲召老僧，不知法契之緣何似一聽之龍天也。」⁹⁸ 看來，通容也很想進宮弘法，振興臨濟宗風。雖然當時有張立中「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之諷，⁹⁹ 董道權（1630-1689）「而今不作新蒲哭，一任煤山花鳥愁」之譏，¹⁰⁰ 但是對於以弘法為本職的道忞來說，這些譏諷並未有太大的實際作用。¹⁰¹

94 清·王士禎，《居易錄》（《王士禎全集》第 5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 24，頁 4167。

95 清·爾瞻達尊，《爾瞻尊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4 冊），卷 2〈上天童弘覺老和尚〉，頁 151。

96 此一「僧人群體」，不包括明清之際逃禪的儒士。大部分逃禪者為了躲避清廷政治迫害而剃髮入山，不入城市，鮮有振興佛門之舉。

97 從道忞、牧雲通門、費隱通容等人的作品來看，晚明「佛教經世」思潮至清順治年間仍有延續。尤其是玉琳通琇（1614-1675）、木陳道忞的入宮，給予臨濟宗振興叢林不少鼓舞。有關晚明「佛教經世」思潮的研究，參見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

98 陳智超、韋祖輝、何齡修，《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編號 005，頁 61-66。

99 清·張立中，《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卷 65〈浮屠道忞北上〉，頁 939。

100 清·黃宗羲，〈董巽子墓誌銘〉，《黃梨洲文集》，頁 251。

101 在姚範《援鵲堂筆記》記載有誤、王士禎《居易錄》有必要重審的情況下，有關道忞

換句話說，所謂「故國派」、「新朝派」立場轉變之說，對身處佛門、以弘法為首務的道忞而言並未有深刻的影響。再加上，《百城集》對《布水臺集》的修訂，發生在康熙六年之後，與道忞順治十六年所謂政治立場的轉變相距近十年。討論其中的修訂緣由，相較於順治十六年的入宮，這十年左右發生的事情反而更顯重要，而下文研究得出文本修訂一定程度上正是康熙初年各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因此，《百城集》對《布水臺集》的修訂，與道忞政治立場的轉變，實際上關係不大。

（三）修訂背後的政治暗流

那麼，《百城集》對《布水臺集》的篇目增刪和文字修訂，為何發生在康熙六年至十三年期間呢？這與道忞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所受到的政治庇護密切相關。順治帝在宮中所見《布水臺集》應與順治十六年錢謙益序本大體一致，且集中有「薦嚴毅宗烈皇帝疏」。此疏還使用了南明弘光朝確立的崇禎帝廟號「毅宗」，¹⁰² 對此順治帝閱後有「此亦何妨」的評價。文集既已經順治帝閱覽而無礙，且道忞又獲賜「弘覺禪師」之號，得到順治帝的敬重和支持，不須謹小慎微，回山後就進行篇目增刪和文字修訂的工作。不過，道忞很快就失去了強大的政治靠山，因為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順治帝駕崩。

但實際上，此時道忞還有另一政治上的庇護者——愛新覺羅·高塞。高塞，清太宗皇太極第六子，順治帝庶兄，號敬一主人。世居盛京，幽居醫巫閭山，以詩畫自娛，潛心佛法。初封輔國公，康熙八年九月，進鎮國公。時盛京與鐵嶺、尚陽堡，是清初流人聚集地，高塞在東北結交文士，營建東園，組織東園雅集。¹⁰³ 高塞得知道忞在順治宮廷，朝罷時間從問道，終日無倦容，道忞嘉其好善忘勢、敏而嗜學，有賢士風而無貴人習，並贈以短章。¹⁰⁴ 道忞返回江南後，仍與高塞保持密切的聯繫。康熙元年道忞賦

生前所受到的政治立場轉變的批評，或許並沒有後人想象的那麼多。

102 吳航，〈弘光朝崇禎帝廟謚改易考述〉，收入中國明史學會、十三陵辦事處編，《第十七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紀念明定陵發掘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頁 66-74。

103 李芳，〈清抄本《恭壽堂詩》與清初滿族詩人高塞〉，《文獻》2015.1(2015.1): 61。

104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 卷本），卷 4，頁 324。

詩二首寄高塞以表思念，有「剩有深衷言不盡，那堪迢遞付春鴻」、「此生奉塵知何日？夢寐尤思一握裾」之語。¹⁰⁵ 同年，道忞還寫信請求高塞行職權之便，拯救受「通海案」¹⁰⁶ 牽連的明遺民。現將此信節選如下：

今春有來自瀋陽者，聞檀越子祁生，蒙推屋烏之愛，遂使怖鴿驚魂，依光定魄。抑山僧何幸叨榮施？真勝祁生畫錦還鄉矣！然此案遭誣枉至于家破身亡，累遺親族莫甚，价人、纘曾二錢子為最慘。今兩家妻孥與其弟虞仲方叔咸遠配遐天，流離瑣尾，殊可惻愴。就使山僧縣同陌路、忽若途人，尚當興慈運悲，效先佛投岳割肉之思，況屬檀那？承信施復有公王、救世菩薩，二天可戴、慈蔭可依，忍恬然坐卧，不一告哀，又何顏廁緇流，而稱慈悲眷屬也邪？為此更瀆威嚴，伏冀少舒蓮目、普放豪光，使其停酸息苦，聽贖還鄉，則死生銜結，寧獨錢宗為然？即日升月恆之福，山僧沒齒亦難忘頌禱矣！¹⁰⁷

祁生，即祁班孫（?-1673），祁彪佳（1602-1645）子，與兄祁理孫、魏耕（1614-1662）、錢纘曾等人祕密參與反清活動。「通海案」發生時，有人告密祁氏梅墅是嘯聚之地，清兵至梅墅追捕得魏耕和祁氏兄弟。「價人、纘曾二錢子」，即錢氏叔侄錢價人、錢纘曾。「虞仲、方叔」即錢價人之弟錢志熙、錢志惇。當時歸安知縣吳之榮覬覦錢氏家財，構陷錢價人，以價人為主謀，而魏耕、錢纘曾為價人奔走。¹⁰⁸ 刑部判處結果是「依謀叛律，錢雲五（即錢纘曾，字允武）、錢潔人（即錢價人）擬斬立決，其妻妾子

105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 卷本），卷 5〈寄懷東來堂敬一主人〉，頁 328。另見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 3〈寄懷東來菴庵鎮國公〉，葉 15。

106 有關「通海案」的研究，學界已有研究成果，此處不贅，可參看（1）薛瑞錄，〈魏耕和清初的「通海案」〉，《中國史研究》1989.1(1989.3): 115-119。（2）何齡修，〈關於魏耕通海案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93.2(1993.6): 31-41。（3）謝國禎，〈記清初通海案〉，《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頁 251-259。

107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 卷本），卷 22〈東敬一主人郭子公〉，頁 398。另見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 7〈東菴庵鎮國公〉，葉 1。

108 清·楊鳳苞，《秋室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476 冊），卷 1〈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頁 7-8。

女家產人口解部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解部流徙甯古塔，房地造冊報部」。¹⁰⁹康熙元年二月，魏耕、錢纘曾、錢價人被處死。錢價人之弟錢志熙、錢志焯，及祁班孫則被流放到寧古塔，¹¹⁰流放者實際還包括錢價人的三弟丹季志燾。至於祁理孫，因祁氏門客賄賂官員，得以釋放。

從「屋烏之愛」、「幸叨榮施」二語，知高塞因與道忞的關係而對祁班孫有所照顧。道忞深知錢價人遭陷始末，從佛祖拯救眾生的角度懇請高塞慈悲為懷，令志熙、志焯等聽贖還鄉。抗清遺民聯合鄭氏勢力企圖推翻清朝統治的「通海案」乃清初一大要案，大犯清廷忌懼。在刑部已有判決之後，道忞居然敢向高塞作此哀懇！此事若被告發，道忞隨時有被牽連的危險。可見，道忞與高塞二人的關係非比尋常，不可比擬於一般僧人、居士的關係。這也說明了，道忞作為佛門中人，不但希望高塞從佛法角度慈悲拯溺，而且將高塞作為一股可資政治庇護的強大力量。之後，高塞並未能如道忞所求，對「通海案」流放者有所援助，但是道忞此信發出後依然安全無恙，二人的關係仍舊篤厚如初。這反而更加充分地說明了，道忞確實是受到高塞在政治上的庇護照顧。

康熙六年，高塞寄贈道忞親筆山水二幅、詩一律書扇、黃玉玦一枚、水晶方印池一座。¹¹¹次年，高塞又致信道忞，希望得到一幅道忞行樂圖來瞻仰，如晤對一室以遣離索，並請道忞為盛京新閣題名。¹¹²道忞回信稱讚高塞詩畫技藝精通，以寓周公事之「思兼」、「山鳥」題閣顏。¹¹³康熙九年，晉階鎮國公的高塞致信道忞。書裡行間洋溢著對道忞的敬重和關心，云：「每憶吾師道範清標，常來夢寐，雖道里數千，此心則日親几杖也。……展開法象，不啻躬承色笑。懸之金座，飾作珠裝，朝夕皈依瞻仰。如朗月照

10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刑部殘題本》（《明清史料》已編第6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223-1224。

110 清·全祖望原著，黃雲眉選注，〈祁六公子墓碣銘〉，《鮚埼亭文集選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84-86。

111 清·聞性道、釋德介編撰，《天童寺志》，卷4〈親藩雅賚〉，頁322-323。

112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7〈東甌庵鎮國公又附來信〉，葉2。

113 同上註，葉3。

室，春風拂入，吾師可謂開善誘之門，現無我之相矣。……南方溽暑，珍攝為佳。」¹¹⁴ 道忞回信，希望高塞請旨為平陽創寺賜額。¹¹⁵ 從道忞最後的這封回信，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正在努力地為自己及所主寺院尋求康熙朝廷的認可和保護。遺憾的是，高塞於康熙九年逝世，¹¹⁶ 賜額平陽一事最終不遂，同時意味著道忞失去了順治帝以來清朝王室的庇護和依靠。

高塞逝世前一年的康熙八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此案起因是有人在黃培《含章館詩集》「摘詩中諸句謂為藐國，為欺君」，與黃培有芥蒂的姜元衡還揭發黃培詩文有「怨女金閨裏，征夫鐵嶺頭」、「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之語，致使黃培於康熙八年四月一日遇難。¹¹⁷ 順康時期文網漸密，此獄與之前不同的地方是，士人因文獲罪從自撰史書擴展到了自撰文集，這無疑給當時的文集作者很大的警醒，況且親歷明清鼎革的士人文集或多或少都存有故國記憶。再加上，道忞也十分清楚自己因性格原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士。他在順治六年所寫的〈自贊〉提到自己：

好捏人痛處，專犯人忌諱。故大不理夫人之口而橫罹乎謗誹，甚而告之同門、鳴之官司，而尤未也；災諸木，揭諸途，而惡聲四暨焉！¹¹⁸

道忞「好捏痛處」、「專犯忌諱」的性格，招致了許多不滿和誹謗，相關人士一旦師法「黃培詩案」有所報復，道忞難免有性命之虞。

此外，當時道忞所處的康熙朝，出現了打擊佛教的思想傾向。康熙帝（1662-1722 在位）本人不喜佛教，¹¹⁹ 且康熙元年、三年、四年，朝廷

114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 7〈東覽庵鎮國公又附來信〉，葉 4。

115 同上註，葉 5。

116 《清史稿》記載高塞卒於康熙九年，見於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19，頁 9051。

117 「黃培詩案」相關內容，參見（1）盧興基，〈康熙手抄本《含章館詩集》的發現與「黃培詩案」〉，《中華文史論叢》1984.2(1984.6): 233-241。（2）魯海、時桂山，〈黃培文字獄與《含章館詩集》〉，《文獻》1992.2(1992.7): 271-272。

118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 卷本），卷 19〈山翁自贊·其二十七〉，頁 385。另見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 17〈自題像贊·其十〉，葉 15。

119 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二十六日，康熙帝以「從古聖帝明王未有溺於佛老者」為正論。十月初二，康熙帝有「朕生來不好仙佛」之語。十月初九，康熙帝以二氏之

皆有「汰僧」之議。〈昭覺丈雪禪師紀年錄〉「康熙元年」載：「時泰西天主教穆革我倚許方伯勢，諸當道信其邪說，有圖廢釋教之舉。」、「康熙三年」載：「時秉鈞者奉天主教湯若望，仍行左道，又有沙汰之說。」¹²⁰康熙四年，道忞寫給納喇明珠的〈柬公黻明大人〉載：「茲者吾黨僧徒為廣督糾參，蓋法久弊生，玉石叕濫，人之多言，又何怪焉？賴祖澤皇恩，穹崇浩大，所以朝議再四，僅有登名納牒之典。」¹²¹又劉性槩〈清香林期場記〉載：「是役也，起康熙二年癸卯，滿四年乙巳。時朝廷以地震求言，廣督盧公以汰僧題部議，不允行，稽核名數而已。」¹²²康熙七年（1668），道忞在寫給龔鼎孳的信中就有「疏逖幽人」¹²³之感。失去政治庇護的道忞，在「汰僧」不息的政治氛圍中，得知「黃培詩案」始末，再觀照手頭上的大量詩文，難免會聯想到自己像黃培那般的遭際。大致在這一時期，道忞著手進行有關《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的修訂工作，這一修訂一直延續到康熙十三年道忞示寂之前。一方面是增加康熙六年之後的作品，另一方面則是前文所述的篇目增刪和文字修訂，後者可見他對文字與政治關係的高度敏感。道忞在編輯《百城集》時，心中逐漸醞釀出一套檢制約束自己的標準，¹²⁴以免如黃培一般落下文字把柄而招禍。以此觀照《百城集》所收的王仕雲〈山翁禪師全集序〉，此序以「道學正傳」為評價視角被刊示出來，正反映了這一時期道忞對思想環境變化的把握。

書「大都荒唐幻妄」。見於《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819、880、893。

120 清·松齋徵中，〈昭覺丈雪禪師紀年錄〉，《昭覺丈雪醉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67冊），頁469、471。

121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7〈柬公黻明大人（癸卯夏五）〉，葉8。

122 清·劉性槩，〈清香林期場記〉，收入清·聶元善纂修，《（乾隆）高安縣志》（《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35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卷11，頁203。

123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卷7〈復芝麓龔大宗伯·其一〉，葉11。

124 這一說法源自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393-500。

六、結 論

本文考述清初漢僧木陳道忞別集的流傳刊刻、諸集關係、增刪修訂等文本問題，主要論點如下：

第一，現存道忞別集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各集特點價值如下：《北遊集》的《徑山藏》本由單行本刪定而成，單行本收、《徑山藏》本不收的作品有十九題三十一篇及五段語錄，單行本燕大鈔本有兩篇不見於他載。《西巖隱集》屬日本鈔本，集中不見於他集的作品共 10 題 14 篇。《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收有不見於他集的作品共 38 題 41 篇，同三十二卷本屬《徑山藏》之《又續藏》版本，另三十二卷本的中科本比臺北本多出一篇，且版刻不一，顯示了《又續藏》較為複雜的版本情況。《百城集》作品編年繫地，已知十六處有誤，是有關道忞康熙七年至十三年（1668-1674）活動的唯一資料。

第二，道忞流傳、現存別集間的主要關係：現存《布水臺集》二十卷本、《西巖隱集》是全集本來源之一的文本。康熙六年或稍後，由《禪餘集》、《布水臺集》、《雲僑集》、《西巖隱集》、《北遊集》、《停梅集》等六集增刪合編而成《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康熙十三年，《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經篇目增刪與文字修訂後形成《百城集》。《布水臺集》二十卷本接近於順治十六年錢謙益序本、順治帝經眼本，三十二卷本接近於康熙八年黃宗羲經眼本、康熙十年王仕雲序本。

第三，道忞別集的形成、接受、修訂，與其個人同清初政治的聯繫密切相關。進入順治宮廷前，道忞別集獲得「忠孝節義」的評價，受到江南明遺民群體的高度贊譽。進入順治宮廷若干年後所形成的別集中，「忠孝節義」轉變為「道學正傳」的評價視角，反映了道忞對思想環境變化的把握。至於《百城集》對《布水臺集》三十二卷本的修訂，與順治十六年道忞入宮後所謂的「故國派」、「新朝派」立場轉變關係不大。當時叢林面臨著佛法凋敝的現實，道忞入宮獲得了牧雲通門的大力支持，康熙三年見月讀體還造訪道忞，二人相談甚歡。實際上，這一修訂一定程度上是道忞失去愛新覺羅·高塞的政治庇護、康熙初期「汰僧」不息的政治氛圍、「黃培詩案」的發生等因素綜合影響下的結果。

第四，道忞別集對於明末清初佛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研究具有重要價值。道忞為愛新覺羅·高塞所作的詩文，以及二人交往的書信，揭示了道忞與清王族高塞在佛門善知識、居士關係之外，在政治上的被庇護與庇護關係。道忞入宮弘法獲得叢林支持，並企圖通過高塞拯救受「通海案」牽連的明遺民，反映道忞借助朝廷王室力量來挽救日益頹敝的佛門，並且不顧安危地向王室請求拯救明遺民。有關道忞與清初政治的討論，僅注目於順治十六年入宮前後的所謂「故國派」、「新朝派」立場並不全面。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清·丈雪通醉，《昭覺丈雪醉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67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20卷，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30卷，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清·木陳道忞，《西巖隱集》，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藏經書院文庫藏本。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明版嘉興大藏經》第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32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3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木陳道忞，蕭卓點校，《道忞和尚選集》，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17。

清·木陳道忞，《弘覺忞禪師北游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木陳道忞，《北遊集》，《禪門逸書續編》第10冊，臺北：漢聲出版社，1987。

清·木陳道忞，《山翁忞禪師語錄》22卷，《徑山藏》第207-208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清·木陳道忞，《天童弘覺忞禪師語錄》20卷，《徑山藏》第164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 清·木陳道忞，《禪燈世譜》9 卷，《禪宗全書》第 1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清·木陳道忞說，雪樵真樸編次，《弘覺忞禪師北遊集》6 卷，《明版嘉興大藏經》第 2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清·王士禎，《居易錄》，《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 清·王時敏，《王煙客先生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天孚湛祐，《弘慈廣濟寺新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第 44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 清·天嶽本畫，《直木堂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清·全祖望，《鮚埼亭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全祖望原著，黃雲眉選注，《鮚埼亭文集選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清·牧雲通門，《懶齋別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1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 清·牧雲通門，《古南澹翁老人懶齋遺稿》，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
- 清·姚範，《援鵝堂筆記》，《續修四庫全書》第 11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清·馬元、釋真樸，《重修曹溪通志》，《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111 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
- 清·張立中，《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 清·超永，《五燈全書》，《卅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2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 清·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清·黃炳堃，《黃梨洲先生年譜》，《續修四庫全書》第 5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馮鼎高修，王顯曾等纂，《（乾隆）華亭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輯》第 1 編第 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 清·淨柱，《五燈會元續略》，《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80 冊，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 清·源諒，《律宗燈譜》，《大藏經補編》第 22 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
- 清·楊鳳苞，《秋室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4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清·楊芳燦，《芙蓉山館文鈔》，《續修四庫全書》第 147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爾瞻達尊，《爾瞻尊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4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 清·聞性道、釋德介，《天童寺志》，《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85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
- 清·趙起士，《（康熙）徽州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
-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清·錢謙益，《錢牧齋先生尺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0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清·錢光繡，《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 清·錢維喬修、錢大昕等纂，《（乾隆）鄞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輯》第 1 編第 75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 清·聶元善纂修，《（乾隆）高安縣志》，《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 3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刑部殘題本》，《明清史料》已編第 6 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
- 陳智超、韋祖輝、何齡修，《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
-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駒澤大學圖書館，《新纂禪籍目錄》，日本：佛書刊行會，1962。
- 劉繼超修、溫廷敬等纂，《（民國）新修大埔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第 22 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二、近人論著

- 王汎森 2013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393-500。
- 王汎森 2020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兆鵬 2021 〈從「年譜」到「編年繫地譜」——重建作家年譜的理念與範式〉，《文學評論》2021.2(2021.3): 17-24。
- (日)吉川幸次郎 1970 〈居士としての錢謙益〉，《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6 卷，東京：築摩書房，頁 36-54。
- 何華珍 2011 〈俗字在日本的傳播研究〉，《寧波大學學報》24.6(2011.11): 48-53。
- 李 芳 2015 〈清抄本《恭壽堂詩》與清初滿族詩人高塞〉，《文獻》2015.1(2015.1): 61-65。
- 何齡修 1993 〈關於魏耕通海案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93.2(1993.6): 31-41。
- 法 幢 2021 〈「大藏經」的再認識〉，收入吳疆、王啟元編，《佛法與方法：明清佛教及周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152-182。
- 吳 航 2018 〈弘光朝崇禎帝廟謚改易考述〉，收入《第十七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紀念明定陵發掘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頁 62-74。
- 冼玉清 2016 《廣東釋道著述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日)荒木見悟 1996 〈禪と名教——木陳道忞の変節〉，《東洋古典學研究》1(1996.5): 11-23。
- 柴德賡 2017 〈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27。
- 姜伯勤 1993 〈論木陳道忞〉，收入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編，《潮學研究》第 1 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16-34。
- 陳永革 2007 《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陳 垣 1962 《清初僧諍記》，北京：中華書局。
- 陳 垣 1980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
- (日)野口善敬 1996 〈關於木陳道忞的著述〉，收入黃俊傑等編，《東亞文化的探索——傳統文化的發展》，臺北：正中書局，頁 489-507。
- (日)野口善敬 2011 〈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天童寺の住持について：密雲円悟の後

- 繼をめぐって》，《禅学研究》89(2011.2): 17-45。
- 康凱淋 2010 〈論清初官方對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的批評〉，《漢學研究》28.1 (2010.3): 295-323。
- 黃永年 2005 《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廖肇亨 2005 〈淫辭豔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清初戲曲美學的佛教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6(2005.3): 127-160。
- 劉乃和 2002 《陳垣年譜》，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薛瑞錄 1989 〈魏耕和清初的「通海案」〉，《中國史研究》1989.1(1989.3): 115-119。
- 魯海、時桂山 1992 〈黃培文字獄與《含章館詩集》〉，《文獻》1992.2(1992.7): 271-272。
- 盧興基 1984 〈康熙手抄本《含章館詩集》的發現與「黃培詩案」〉，《中華文史論叢》1984.2(1984.6): 233-241。
- 謝正光 2009 〈新君舊主與遺臣——讀木陳道忞《北遊集》〉，《中國社會科學》2009.3(2009.5): 186-203。
- 謝國楨 2013 〈記清初通海案〉，《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北京出版社，頁251-259。
- 藍建雄 1975 「道忞法師研究」，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韓錫鐸 2008 〈《嘉興藏》各本異同略述〉，《文獻》2008.2(2008.4): 181-183。
- 饒宗頤 1994 《潮州藝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饒宗頤 1996 〈清初僧道忞及其《布水臺集》〉，《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562。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uchen Daomin's Collected Works and Related Textual Issues

Chen Xiao-dan^{*}

Abstract

The existing collected works of Muchen Daomin 木陳道忞 (1596-1674) include *Beiyou ji* 北遊集 (*Journey to the North*, six *juan*), *Xiyan yin ji* 西巖隱集, *Bushuitai ji* 布水臺集 (twenty/thirty-two *juan*), and *Baicheng ji* 百城集 (thirty *juan*), which are separately held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ushuitai ji* with a preface penned by Qian Qianyi 錢謙益 (1582-1664) was widely circulated, to the extent that both the Shunzhi Emperor and Huang Zongxi 黃宗羲 (1610-1695) had read it. The document value of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the above collected works is also rather high as each tends to have its own unique contents, some of which are markedly rare. The twenty- and thirty-two-*juan* editions of *Bushuitai ji*, for example, have both been included in the “second supplement” 又續 to the *Jingshan Canon* 徑山藏, and the thirty-two-*juan* printings held by the Universit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Beijing)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differ,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e complex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printing of the “second supplement.” In addition, the chronicles and locations found within *Baicheng ji*, which is the only remaining information on the activities of Muchen Daomin from 1668 to 1674, provides a reliable time coordinate for an examination into his historical traces.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of Muchen Daomin's collected works is that in 1667 or slightly thereafter, *Chan yu ji* 禪餘集, *Bushuitai ji*, *Yunqiao ji* 雲僑集, *Xiyan yin ji*, *Beiyou ji*, and *Tingmei ji* 停梅集 were compiled, with additions and deletions, into the thirty-two-*juan* edition of *Bushuitai ji*; and following further revisions, *Bushuitai ji* was then shaped into *Baicheng ji* in 1674. The emendations had little connection with shifts in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Muchen

* Chen Xiao-d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Daomin, instead being a result of certain events such as his loss of political asylum from Gose Aisin Gioro 愛新覺羅·高塞 (1637-1670),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surrounding the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in the early reign of the Kangxi Emperor (r. 1654-1722), and the “poetic inquisition of Huang Pei” 黃培詩案 in 1666. In a wor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uchen Daomin thus have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Muchen Daomin 木陳道忞, collected works, textual issues, document value

